

启蒙运动与五四罢工

沈以行

(一)

上海五四罢工(一般称六三罢工)提出了“罢工救国”的号召,是一次政治罢工,涉及100000人以上,其原因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学生被捕,这些大家都已知道。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自觉姿态与工人队伍的数量大有关系,大产业中的工人,觉悟往往高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工业得到发展,产生了觉醒的一代工人。据《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所载文章,说到:幸而欧战发生,欧美之商品来源断绝,其从事远东商业者亦皆归国从戎。此际日资乘虚而入,然因二十一条之故而遭国人抵制,我国工业乃得千载难逢之发展机会。

该纪念刊又据海关和农商部统计材料称:以1915年进口45000万两与1913年(战前)57000万两相比,因欧战关系而跌去五分之一(战后外资卷土重来,至1920年进口达76000万两)。民族资本工厂注册者到1919年止,共475家,而战时开设者达162家,为总数的三分之一(规模大小不计,其中有豆腐厂一家,估计不过数十人吧)。另据材料,这些民族资本工厂战时都赚了钱,如申新纱厂赚100万元,恒丰纱厂100万元,都是资本家自己透露的。简氏弟兄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补市场上英美烟厂卷烟之缺货,这是1916年的事。此际,工人数量当然增加,据《新青年》杂志的材料,五四时期上海产业工人已达245,000人,而在500人以上工厂做工者150,000人,将达三分之二。查工厂规模以拥有工人500人以上为一档,盖出于俄国人之统计。十月革命时,俄国500人以上工厂工人占产业工人总数之54%,斯大林说工人阶级已成为最重大的力量;我国产业工人就全国来说远未达到此比例,但就上海一埠来说,则又超过了。此所以上海工运执全国之牛耳也。今见新出刘明逵氏所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共4卷,14册,已出第1册。其对工人数量之统计已将500人以上者尽可能特列一档,这是突破了旧格的创新之举。

工业发展,队伍扩展,斗争必然亦随之大有增进。欧战以来罢工之兴起,也是工人自觉姿态的一个因素,一个标帜。拙著《工运史鸣辨录》(以下简称拙著)对于彼时罢工的统计,不采用每10年为一等的等分法,而采用反映客观趋势的不等分法,以显示事态的进展性,其结果如下:

1879年(首见罢工)——1894年

16年中凡罢工12次,年不足一次。

1895年(马关条约)——1913年

19年间罢工94次,年5次。

1914年（欧战）——1919年5月

5年间罢工85次，年17次。

可见罢工之增幅，日趋上升。故1917年7月《民国日报》有如下之记载：

数月以来，罢工之声，不绝于耳。

此种不绝于耳之声势，使事物上升一级——当时已有同盟罢工之趋势，即在商务印书馆罢工时，中华书局和文明书局之职工一齐罢工支援；而三书店资方亦有协议：凡一方因罢工而开除之职工，其他两方均不得收用之。这就明显地显示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画面了。同时，罢工中出现了先驱人物。如商务印书馆杨昌元，“目击资方之压迫，工友之痛苦”，组织“集成同志会”，“联络同志谋解放之策”。今商务印书馆史料已出版，记载了1917年3月中文排字减低计数额（原来空白及标点符号均计入字数，现不计入），引起排字工人杨昌元等提议与资方谈判，遭拒绝，于是罢工，失败，代表四人被解雇。可见先驱者往往就是牺牲者，而资方犹称“败固不佳，胜亦非福”，只愿意工人驯服无事。经历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觉醒，到了五四风暴来临时，工人为爱国心之驱使，遂有“罢工救国”的壮举。

以上叙述五四以前上海工运状况，大抵如是。过去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工运兴起同时进行的震动社会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则不涉及。认为这是两股道上的车，不必在工运史中说到它。现当五四运动70周年，我细思之，启蒙运动对于当年工人运动有着潜在的内在的关系，他们之间，工人运动与启蒙运动，有着共同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同根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二）

对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亦即启蒙运动，拙著中曾有一段话：

……这种对封建上层建筑的冲击，本来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前先走一步，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如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那样，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则无力进行之。针对封建上层建筑的革命，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

——《六三罢工探讨》，1979年。

我现在认为仍旧应作如是观。事实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却没有进行思想革命，封建体制及其一切附属形态只作了一些表面改动，而实质内容一仍其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派遣党人出发，以及委托海员携带，都属枪枝、炸弹等火爆品，却无宣传品，也就是说，他不重视发动舆论，只指望依仗暴力一举推翻帝制。故在已故陈旭麓同志著作《近代史思辨录》中，曾经慨叹要找一份辛亥革命当时权威性的报刊，竟不可得。反之，孔教杂志却能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版，袁世凯称帝之际，制订所谓《天坛宪章》，报纸都套红，记者称“臣记者”（均见旭麓遗著），可见情况之糟糕！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已如上述。于是一方面工人

阶级以自觉姿态登台；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身的意志要求也得到大萌发，那些民权思想、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实业计划，例如孙中山建筑十万里铁路的设想——他宁可抛去总统这个职位来换取之。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两者俱不曾得到，而思潮已经大萌发。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陷于混乱，这有利东方之觉醒，可是由谁来作为代言人登高一呼呢？这时中国资产者办实业很得手，要作为政治代表站出来，他们还缺乏远大的眼光和领袖的素质，这个代表人的职司，不能不李代桃僵，落到无产者代表人物的身上，于是而有南陈北李之出台。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所处时代条件的特点，无产阶级担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中国无产者强过于资产者的地方。

先说南陈。我所熊月之同志在他著作中引毛泽东早年刊登于《湘江评论》上的文章，称陈独秀为我国“思想界之明星”，这个评价是十分确切的。陈独秀是我国思想界指挥三军扫荡封建巢穴冲锋陷阵的主将。他的战斗，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他在该刊一卷五号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可以说是一篇进军宣言！该文说以前种种至1915年而死，以后种种自1916年而生，要以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使民族更新！他要推倒儒家三纲，尊重个人自主，并且开展国民运动。他似乎预见到新时代即将来临而写了这篇“宣言”，因为次年即在俄国发生两次革命，使世界局势大变，革命之潮大兴。

陈独秀锋芒毕露，运笔如刀，他对封建主义的核心——孔教痛加无情的鞭挞，说：

孔教之精华为礼教，为我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而其湮没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等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侵削，我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故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皆见《新青年》）

又阐释说：

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儒者三纲之说，为我伦理政治之大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我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我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很明显，独秀之痛斥三纲，鞭此大原，强调最后觉悟，是为新思潮夺取阵地之故。

此际胡适提倡白话文，独秀为有利于占领新思潮阵地，对此大加赞赏，胡适对白话文规定八条：

一为不用典，二为不用陈套；三为文废骈，诗废律；四为白话作诗，五为注意文法；六为不作无病呻吟；七为不模仿古人而以自我作主；八为言之有物。

独秀对此八条除提出注意文法应作注意修辞，言之有物不可误解为文以载道之外，皆表赞同。当时古文垄断文坛，又流行四六骈体文，以对仗、用典、辞藻华丽、言之无物为胜，

故胡适提出八条，有其针对性；而独秀则把古文家自韩愈至桐城派历数 18 人，称为十八妖魔，刺之曰：“十八妖魔，称霸文坛，直无一字存在之价值。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战者，余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真是何等的豪言壮语呀！从此，白话文跃登文坛，以清新之气，写小说，写剧本，写诗，自由挥洒，开辟了全新的园地。

此外，《新青年》还刊登指出礼教吃人的吴虞的文章，还有鲁迅的著名作品《狂人日记》。《新青年》之外，又有以“伦理革命”为号召的《新潮杂志》等等。总之，当其时也，书刊如林，志士如云，万箭齐发，一齐射向封建礼教，孔门谰言，三纲五常，宗族权威，给予迎头的痛击！革新者提出的号召是：科学与民主。当时通俗的说法是请德先生来，请赛先生来！其实科学的反面是愚昧，民主的反面是专制，所以，这个号召反而言之，就是要消除愚昧与专制。凡专制的政治，必生愚昧，而愚昧所丛集，专制即赖以存在。这可以说是旧中国的基本面貌，而新文化运动猛力冲击者正在于此。

1917 年，俄国两次发生革命，消息传来，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项鼓吹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内容。在这方面，李大钊出力最多，立功最大。大钊为人，布衣布鞋，淘淘如鄙人，鲁迅说大钊有点像北京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然其胸中邱壑，自有大志，笔底文章，无人能及。我们不应忘记：大钊是上了绞刑架而为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共产党人之一，临刑泰然自若，说了两句话：你们杀我李大钊，杀不尽中国的共产党！

1918 年 7 月，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内称：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

李大钊进而区分法俄革命的异同，说：

法兰西……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在当时，俄国革命成败未定，欧洲政局亦在纷乱之际，能够这样清楚、明确地分普法俄革命之异同，予人以信心，大钊之外，别无第二人。其为饱学之士而又深具革命意识，方有此判断力！

欧战结束之际，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歌颂新潮流的胜利，欢呼新时代的来到。这些著名的文章，可以说是奠定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动摇的地位。后来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索性和盘托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都公诸于世，实属大有功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布！

李大钊的信念，可以用他诗人般的语言来表达：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故若如前所说，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那末，李大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新文化启蒙运动有此南陈北李，乃是时代的光荣，是我民族的光荣！

归纳起来说：反封建——向着纲常名教猛力冲刺；提倡白话文；引进俄国革命的思潮；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做的三件大事。它的影响遍及全社会。如前所述，出于内在的同根之关系，当然也影响工人运动。事实上、启蒙运动是在与工人运动同步调前进，过去只因我们不加注意，就认为无关罢了。

(三)

但中国的封建主义毕竟有数千年历史，根深，蒂固，叶茂，势大，靠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冲击，再猛也远不能动摇其根本。因为如前所述，中国工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但从全局来看，旧中国毕竟不是大工业国，它并无欧美产业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大生产意识，来与它固有的大封建主义相匹敌。加以时局变化，欧战结束，巴黎和会，欺我积弱，日占山东，举国共愤，学生带头，遂有五四爱国运动。新旧思潮的激战，演变而为政治斗争，而一触及政治领域，原来的封建分子，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跃而起，干戈扰攘，无有宁日。而冲击者方面有的猛进，有的牺牲，有的做官，有的隐退，起了很大的分化。科学与民主，也就显得冷落起来，这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憾事。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还能整其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不已，直到兴起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

也有一种说法：工人目不识丁，看不懂《新青年》杂志，所以无关。其实，问题不在目不识丁与否，而在于是否处于同一命运。当年封建之积弊，工人同样是受害者，工人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即因名教等级观念所致(陈独秀文章中常将等级写作阶级，其实他指的是等级)。举例来说，旧时上海有轨电车为两节，一节车身，一节拖车；车身那一节，又分隔为两厢：头等等与三等。凡坐头等者不外乎是洋人和高等华人；工人只能坐三等，而且往往不能坐进车身那一节的三等，而要被赶进拖车里去。在这里，拖车是车之末尾，而工人是社会之末尾，名教所定，每下愈况，无可相强。当时的租界，当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然其推行，往往又以中国固有的名教礼法为依托，否则，高等华人何以又能坐进头等车呢？

又如家长权威，父为子纲，莫如巴金著名小说《家》中的高老太爷，这个封建老鬼死后还要害其孙媳妇瑞钰，由陈姨太出来说不能让血光冲了老太爷的阴魂，硬把临产的瑞钰逼死。工人当然没有高家那样的大家庭，但是爷叔辈份也有其权威性(这里不说流氓帮会中的辈份)。记得解放后我们为了了解顾正红的事迹，特为到工厂里去找到一个说是顾正红的爷叔的人，请到工会来待如上宾，后来工厂搞民主改革了，才知此人原来是个工头，请来待如上宾是上了当了。只怪我们身居洋场而不知封建之深，上了这个当。至于夫为妻纲，那末女工把工资拿给丈夫去赌博，是常有的事。20 世纪初年以来，上海丝厂罢工频繁，带头的女工连个名字也用不上，报上登载的是以王张氏、李孙氏见称，这正说明女工自己挣了钱，却还

摆脱不了封建的羁绊呢！

可见，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冲刺面，同样是工人的受害处。目不识丁怎么办？可以听那看懂书报的人讲。1918年，上海也出了一本刊物名叫《劳働》，自3月至7月，共出五期，由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主编。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惯例，文章作者不具真姓名，只用弹指、劳人等笔名。刊物的宗旨定为尊重劳动，灌输劳动主义。当时日本人轻视中国工人不识不知，诬称“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而《劳働》则刊登1918年5月1日间上海小贩罢市、人力车夫风潮的照片和记载，又有若干手工业工人罢工的报导，还有广州160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报导，以示中国工人的觉醒。

刊物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潮，特别关心俄国革命。说：

东欧有大国焉，扬旗伐鼓，声容惨澹，非俄民之奋起而为社会革命之先驱耶？（第1期）

只有那些不幸的劳动者天天盼望他们俄国过激党的革命早早成功，早早普及，好大家共享平等的幸福，同过自由的日子。所以俄罗斯来的电报是格外得人注意，过激党传来的消息格外得人欢迎。（第2期）

法兰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故其震动环球有不容不细心研究者。（第3期）

该刊5期中共刊登包括《李(列)宁传略》在内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共有10篇之多。可见早年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宣传共产主义也是有贡献的。该刊第5期刊登留法勤工俭学的报导和文章，后来一批又一批革命者陆续赴法，原来导源于此。

书刊之外，当其时也，演讲是很流行的。1918年11月协约国战胜之际，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庆祝大会上演讲，题为《劳工神圣》，提出不论用体力，还是用脑的，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劳工被赞为神圣，这确实是启蒙运动新时代的声音！至于日常活动中的演讲，更属多见。后来不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五卅运动中，学生向商店借一条板凳，站在店门口就演讲起来，工人不都可以听到吗？

还有就是三五工人自己到茶馆里聚谈，只需要化几个铜元泡一壶茶，就可以办到。君不见作家老舍著名的剧作《茶馆》吗？三幕剧反映了三个时代：清朝末年，民国时代，蒋介石时代。在这家茶馆里醒目处，始终都贴有红条纸，写着：“莫谈国事”。这不正说明茶馆原是个谈国事的地方吗？

走出茶馆就是街头巷尾。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说：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邓中夏是我党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从工运首屈一指之地的上海，南至粤港，北去铁路，他都做了不少工作，他所写的，无疑是经验之谈。

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传布信息的方法，叫做“窃窃私语”吧！那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

了。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岛”已不存在，什么进步刊物也不能出版、什么抗日宣传工作也无法公开做了。（那时只剩下一个苏联人编的《时代周刊》，因为苏日订立中立条约的关系，还能在上海印发，但它以报导苏联卫国战争为主要内容。）于是刘长胜同志就出面邀请各产业中的老工人代表，到解放区去参观一圈，这从江苏天长县、六合县都可以走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那里就有一个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是党内领导上海职工运动的。老工人参观过后，领导人给他们讲抗战胜利的形势，了解他们各自工厂的产业情况和工人情绪，然后在临行时嘱咐他们道：回到上海，对这里看到，听到的，只能给可靠的朋友讲讲，可不要随便去讲呀！老工人回到上海，果然只找可靠的朋友讲了，也如法嘱咐一番。事实上，各人都有可靠的朋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谁也没有随便讲，可是传布的范围相当广了。可见凡要传布进步的思潮，总是可以克服困难做到的。五四之际，工人们在通过前述各种渠道接受新思潮后，可用“窃窃私语”法加以传布，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以上所述都是工人接受启蒙之道，亦即启蒙与工运相连之处，是不可忽视的。启蒙运动、工人运动，原是一股道上的车，从启蒙运动到五四罢工，就是这样衔接了。所以，与其说五四罢工为主体，不如说，工人罢工也是受启蒙运动的启迪。

[附记]

本文于1989年4月25日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运史研究室宣读，经任建树、任武雄、姜沛南等诸同志提了意见，今修改发表，特对上述诸位表示感谢。

作者，于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

（原载《史林》1989年第3期）